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 主办

中国诗歌研究

动态

第十八辑

• 古诗卷 •

学苑出版社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 主办

中国诗歌研究动态

第十八辑·古诗卷

學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诗歌研究动态. 第十八辑, 古诗卷/赵敏俐

主编.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16. 11

ISBN 978 - 7 - 5077 - 5140 - 6

I. ①中… II. ①赵… III. ①古典诗歌 - 诗歌研究 - 中国 IV. ①I207. 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89713 号

出 版 人: 孟 白

责任编辑: 刘 丰

出版发行: 学苑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 2 号院 1 号楼 100079

网 址: [www. book001. com](http://www.book001.com)

电子信箱: [xueyuanpress@163. com](mailto:xueyuanpress@163.com)

销售电话: 010 - 67601101 (营销部)、67603091 (总编室)

印 刷 厂: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印张: 787 × 1092 1/16

印 张: 29. 25

字 数: 45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02. 00 元

编 委 会

主 编：赵敏俐

执行主编：姚苏杰 孙晓娅

编 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光明 王兆鹏 方 铭 左东岭

刘福春 李昌集 吴伏生 吴思敬

吴相洲 林 莽 施议对 钟振振

钱志熙 徐 炼 黄卓越 蒋 寅

蔡 毅

编 务：马富丽

本期编辑：曹美晨 王静涵 杨传召

目 录

屈原与《楚辞》研究专题

主持人语：青年学者应多关注《楚辞》研究领域 ◇姚苏杰/1

屈原思想浅探

——兼论其在战国思想史中的位置问题 ◇郭 玥/3

黄灵庚校本《楚辞补注》字词疏解札记 ◇姜国中/14

《九章·惜诵》“发愤抒情”解 ◇李 丹/20

洪兴祖著书目录考 ◇秦佳佳/30

吟诵专题

论楚辞的吟诵 ◇华 锋/44

“常州吟诵”三十年 ◇秦德祥/54

成都话吟诵研究初探——以流沙河先生的吟诵为例 ◇王传闻/58

文读语音成因浅谈及示例 ◇王海兴/71

唐调吟诵的三个要素 ◇魏嘉瓚/81

唐文治的吟诵理论 ◇朱立侠/88

论文索引与摘要

2013 年中国古典诗歌研究论文索引 ◇王静涵 整理/97

2013 年中国古代诗歌研究硕士论文索引 ◇杨传召 整理/191

2013 年中国古代诗歌研究博士论文

索引及摘要 ◇杨传召 整理/230

目

录

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简介

2010 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华吟诵的抢救、整理与研究”简介（附阶段性成果报告）/326

2010 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乐府诗集》整理与补编”项目简介/350

研究综述

《宋书·乐志》研究综述 ◇史 文/354

晚唐诗人唐彦谦文献研究综述 ◇宋学达/368

书 评

激活唐诗意象的诗性生命

——读陈伯海先生《意象艺术与唐诗》 ◇查清华/380

当代乐府学的奠基之作

——读吴相洲《乐府学概论》 ◇郭 丽/385

前修未密，后出转精

——评上海古籍出版社版《楚辞补注》 ◇李凤立/389

地域、生态与唐代文学图景的书写视角

——李娜《唐代关中生态与文学》阅读札记 ◇田恩铭/393

会议综述

中国诗歌研究中心第十四届学术委员会暨中国诗歌理论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 ◇蔡 磊/398

“诗歌研究：文献与方法”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 ◇元 晴/399

“诗歌史·诗歌选·诗歌的经典化”中法学术研讨会在巴黎召开
◇吴湜珏珊/400

跨越时空的中国诗情——记赵敏俐教授在法国东方语言文化学院的报告 ◇贾学鸿/403

上海大学“清代诗学文献整理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侧记 ◇严勤铭/405

先秦文学与文献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 ◇李 辉/410

中日汉诗研讨会在京举行/411

学人志

黄灵庚教授/413

尚永亮教授/434

诗歌研究中心动态

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十二五”

工作总结 赵敏俐/446

目

录

主持人语：青年学者应多关注《楚辞》研究领域

◇姚苏杰

屈原与《楚辞》应该说是当前古典文学中一个方兴未艾的研究领域。仅就《中国诗歌研究动态》近两辑搜集刊载，在2012年和2013年这两年之内，发表于知名刊物上的关于《楚辞》的单篇研究论文就有19项和36项之多，这在同层级的专题研究领域中仅次于《诗经》（66、90项），成果是非常丰富、精彩的。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其中比较明显的一点是，青年学者对此关注相对较少。仅以2013年为例，以屈原或《楚辞》作为选题的可查的硕、博论文仅7篇，而同年《诗经》的硕、博论文有45篇以上，两相比较可知差距之明显。

作为中国诗歌源头之一及抒情文学的早期典范，屈原与《楚辞》对后世影响之大毋庸置疑，有时甚至具有某种符号或象征意义，如魏晋时竟有“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之说（《世说新语·任诞》载王恭言）。自汉迄于清，关于屈原与《楚辞》之论著可谓汗牛充栋（周建忠先生有《五百种楚辞著作提要》，亦仅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一部分），而影响最大者当属东汉王逸所作《楚辞章句》及宋洪兴祖所作《楚辞补注》。王逸《章句》早已散佚，其内容多存洪兴祖《补注》中，故洪书亦可谓古代《楚辞》文献之最重要者。

本辑“书评”将介绍我中心兼职研究员黄灵庚教授新点校之《楚辞补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出版），“学人志”亦将介绍黄灵庚教授之生平、学术。《楚辞补注》一书20世纪80年代曾有中华书局点校本，影响很大，但其存在的一些问题，虽经学界共同指正及多次修改，仍不能完善解决。黄灵庚教授之新点校本，即在底本、校勘、标点等方面，全面吸取近三十年来成果，做了一个汇总完善。另外，由黄灵庚教授主编、本中心主任赵敏俐教授、兼职研究员方铭教授为副主编的《楚辞文献丛刊》，亦于2014年由国家图书出版社出版。丛刊为十六开本共80册，收录国内外各大图书馆重要楚辞学文献200余种，

其中宋刻本 7 种、明刻本 37 种、稿钞校本 55 种，有百余种珍稀文献系首次刊布，是迄今文献最珍稀、品类最齐全、规模最宏大、编排最科学的楚辞文献丛书，这也为今后的楚辞研究提供了更多的便利。

基于上述原因，本辑此次特设了“楚辞研究”专题，刊登四篇在读研究生的文章。他们在学术道路上刚刚起步，或处于初窥门径的阶段，但他们对于《楚辞》研究都表现出学术热情，这是值得鼓励的。比如姜国申、李丹二文对《楚辞》中关键词的考释，郭玥文对屈原思想研究的反思，秦佳佳文对洪兴祖著作的追索，都具有一定学术敏感度。这些研究，其观点或未必成立，其结论或未为完善，其语言或有幼稚之处，但从他们提出的问题中却可以看出年轻人的兴趣所在，也应该受到关注。我们也希望更多的青年学者，尤其是刚刚步入学术道路的研究生，主动地或在导师的指导下，将《楚辞》作为自己学习、研究的方向，向这一重要的学术领域投射热情、贡献力量，这既对该领域的发展有益，也对青年学者的培养有益。这也是设立此专题的目的之一。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

屈原思想浅探

——兼论其在战国思想史中的位置问题

◇郭 珏^①

摘 要：一直以来我们都将屈原的作品视为文学史最重要的发源之一，历代研究屈原的著作也大都以作品内容为对象，至于其思想性质与特点则很少顾及。在思想史书籍中，战国时代的思想也大多是诸子的学说和哲思，很少看到屈原的影子。屈原作品作为先秦乃至中国文学的一个高峰，其反映的思想内涵丰富而深刻，在同时代甚至今天都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其作品即使无法像诸子之说一样有完备的理论系统，但同样是战国时代思想的一种反映，不应被忽视。

关键词：屈原，屈原思想，战国思想

一直以来我们都将屈原的作品视为文学史最重要的发源之一，历代研究屈原的著作也大都以作品内容为对象进行研究。如姜亮夫先生《楚辞书目五种》第一种“书目提要”中的分类：辑注类（124种）、音义类（37种）、论评类（41种）、考证类（26种）。^②从中可以看出，历代研究楚辞者大都用力于文本的辑注训诂或考证，而“论评”一类，以“五四”之后的学者居多。因此赵沛霖先生《屈赋研究论衡》一书的“屈原思想研究模式及其局限性”中讲道：“‘五四’以前的两千余年，这种研究多以屈原作品为主，对屈原本人的研究，则主要集中在研究他的不幸遭遇、政治品德和崇高人格方面，至于对他的思想性质与特点则很少顾及。偶有论述……却缺乏系统归纳和理论总结……我国古代屈原研究领域里的这个空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楚辞学’的深入发展，也影响了对于屈原作品的深入理解。”^③

① 郭珏，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2015级硕士研究生。

② 姜亮夫撰《楚辞书目五种》，中华书局1961年版，总目部分。

③ 赵沛霖撰《屈赋研究论衡》，天津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272页。

无独有偶，在思想史书籍中的战国时代思想，也大多是诸子的学说和哲思，并没有看到在文学史中具有极高价值的屈原的影子，因此，在屈原思想和中国思想史这两者之间，好像并没有什么直接联系。而在葛兆光先生的《中国思想史》中，在战国思想的部分，将屈原的作品纳入思想史范畴，虽然没有单独作为对象分析，但使人注意到了屈原作品所反映的思想的确应该作为战国思想考察的内容。尤其近年来有关楚地出土文献的不断深入解读，屈原作品与战国时代的思想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使笔者注意到，屈原的思想在思想史上大概应有一席之地，即使无法像诸子之说一样理论完备而系统，但或许是战国时代思想的一种反映，不应当被思想史所忽视。因此，本文从思想史和屈原思想研究两方面梳理并阐述这个观点，并对屈原的思想在战国思想史中的位置试做探析。

一、 战国思想史中的屈原思想

“思想史”这一名词，大概可以涵盖哲学史、社会史、学术史等诸多方面，对于“思想史”定义，仍难以有一个确定的说法可以涵盖不同国家、地区的思想发展历程。而“中国思想史”，尤其是先秦思想史，更是由于其特殊性，使得学术史、哲学史、思想史的内容相互混杂而概念不清。因此，葛兆光先生《中国思想史·导论》部分谓“在哲学史被人们反复写来写去的八十年中，以‘思想史’为名的只有寥寥几部……”^①，其中较为有影响的有钱穆先生《中国思想史》、侯外庐先生《中国思想通史》等。而谈到先秦思想，除了参考钱先生、侯先生的思想史外，多半也绕不过诸多哲学史。然而哲学史的范畴一限定，就自动将屈原作品中蕴含的文学性的、缺乏理论和哲学意味的表达排除在外。因此在这样的立场下，并不能将中国哲学史过多纳入讨论范围，只能从思想史这一更大更具有包容性的概念中试着为屈原“争取”一些位置。

比如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是中国哲学史影响最大的书之一，在这部书的战国思想部分，我们看到屈原是以“进步的政治思想”和“唯物主义的宇宙发生论”以及作品中体现的“稷下精气说”而存

^① 葛兆光撰《中国思想史·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页。

在的。这一部分被放在黄老之学后介绍，出现得稍显突兀。对于屈原政治思想的评价，放在哲学思想发展的进程当中总有些不合时宜的感觉，然而阅读之后发现，冯老是以屈原作品印证战国时代出现的种种哲学思想。谈论屈原的政治思想，便讲到其深受法家思想影响；屈子的《天问》便体现唯物主义的宇宙观，而屈子作品中的怪力乱神、飞升入地，又是深受“稷下精气说”影响^①。

我们可以看到，冯友兰先生对于屈原思想的认识，是以屈子作品中深受战国各家思想的影响，将其作为各流派思想印证者的身份放入先秦哲学史中的，而不以他为其个人思想的创立者。提到屈原，虽然使他在战国哲学思想史上有了一个位置，但好像无法构成一种独立的体系与战国时的诸子并立，大约只做了附庸。而在后来任继愈先生、钟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中我们再也看不到屈原的影子，屈原作为一个战国时代各家思想的反映者的身份也就渐渐消失在哲学史当中了。

又如钱穆先生《中国思想史》中讲战国时代思想，是“中国思想史里极光明灿烂的时代”，紧接着又谓“因为有了孔子，遂开出战国思想之繁花，结成战国思想之美果。战国思想，有些在反对孔子，有些在阐扬孔子”。^② 因此在这一章，我们看到钱先生以极其简短的文字历述墨子、杨朱、孟子、庄子、惠施与公孙龙、荀卿、老子、韩非构建的战国时代思想，并且每一节都将其与孔子相联系。很明显，钱穆先生的观点是认为，战国时代的诸子学说构成了整个战国时代的思想主体。

而侯外庐先生的《中国思想通史》构建战国时代思想则更为细化。首先在总论“战国时代思想发展及其衰微”一节，从总体上对春秋到战国思想发展的原因（从阶级、社会形态发展角度等）做了梳理，后又在中篇分析儒、墨二家显学的特点和发展，在下篇分十章论述“百家争鸣”的学术，包含：老子思想、庄子的主观唯心主义、杨朱学派的贵生论和宋尹学派的道体观、思孟学派及其唯心主义的儒学思想、惠施的相对唯心主义、公孙龙的绝对主义唯心思想、后期墨家的墨学发展及其唯物主义思想、中国古代思想的综合者——唯物主义思想家荀子、法家的悲剧历史和韩非子的思想、中国古代思想的没落倾向。

① 冯友兰撰《中国哲学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54页。

② 钱穆撰《当代学术丛刊·中国思想史》，台湾学生书局1988年版，第7页。

从这些章名便可以看出，虽然侯先生对每一家学派思想都做了分析和归纳，比钱先生的思想史更加翔实丰富也更具有“史”的意味（侯外庐先生的思想史着重运用马克思唯物史观，通过阶级、政治经济等分析思想由来），然而依然是以战国时代相对完备、自成体系的诸子学说为主线构建当时的思想史的（这当然也无可厚非）。

上述这种思想史构建，好像似曾相识，因为在中国哲学史甚至中国学术史类著作中，我们都能看到相似的内容。在先秦思想中，思想史似乎并未与哲学史、学术史等有严格区分，因此在传统思想史构建的结构之下（类似哲学史、学术史），屈原作为一个文学家或者爱国诗人，他的作品以及反映的思想，无论如何也难以纳入战国时代思想的范畴，何况对屈原思想本身的研究，也尚未完全达到系统、完备的程度。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思想通史》成书之前，侯先生曾在“中国思想史”古代编讲义大纲的基础上整理扩充，作《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1942年末完成，是《中国思想通史》的一个起点）。而在这部书里，我们看到春秋战国时期思想史的内容与《中国思想通史》高度相似，而其附录部分，在细数几位战国思想家之后，便有“论屈原思想”一节。这篇文章的出现与郭沫若先生在《屈原研究》中对屈子思想的分析有关，侯外庐并不认可郭沫若的说法，因此而作此篇。

仔细阅读《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论屈原思想》部分，发现其对于屈原的评价可以用几个字概括，那就是：悲剧的“观念家”。其言：“至于在时代的人民步调方面，屈原的词歌是适合着的。作为观念家看的屈原，是把战国末期的现实矛盾，客观上暴露无遗，适合于历史的前进步调。”^①侯先生通过对屈原作品语句的分析以及战国时代混乱的现实矛盾，主要侧重于分析屈原作品体现的战国时代的悲剧环境，因此其言：“春秋时代的悲剧中，可以产生管仲、子产那样的正义君子，战国时代的发展了的悲剧，亦可以产生屈原这样的忠贞廉洁的诗人，然而春秋时代可能使管仲、子产做了惠人的政治家，战国时代则不可能使屈原亦做‘古之遗爱’的贤臣良相。春秋时代有管仲、子产‘成仁’，战国时代则只有吴起、商鞅‘就义’，屈原不是走吴起、商鞅的

^① 侯外庐撰《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文风书局1946年版，第327页。

路线，亦就只有景慕管仲、子产了。”^①又说：“我在《屈原思想的秘密》一文，所以拿屈原和王国维、巴尔扎克等人物做比较的研究，只因为要说明一个时代悲剧的矛盾。”^②

侯外庐先生在分析屈原思想时仍然侧重运用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角度，从其政治理想和现实的矛盾，以揭示一个时代的悲剧现状，来说明屈原的思想。在这里，侯外庐先生是着重分析屈原思想的来源来说明当时的社会状况，并非将屈原的思想单独作为思想史的考察内容，而针对屈原个人思想的部分，也最终落脚在爱国的情感和悲愤当中，依旧以一个文学的、而非思想家的角度考察屈原作品中反映的时代思想。而在后来成书的《中国思想通史》一书中，这部分内容更是杳然无踪。

再如葛兆光的《中国思想史》，在读此书之前，笔者从未怀疑过“传统的”思想史有什么“不妥”，当葛先生强行要将思想史、哲学史、学术史等区分开时，才注意到这几种概念间看似相同实而迥异的真实状况。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在上述几部思想史著作中，钱先生构建的战国时代思想史更像是一部哲学史，而侯先生虽然站在史学立场上分析了每种思想产生的社会、阶级根源，然而分析具体学说时仍然沿袭了哲学史以及学术史的轨迹。

葛先生言：“因为精英和经典的思想未必真的在生活世界中起着最重要的作用，尤其是支持着对实际事物与现象的理解、解释与处理的知识与思想，常常并不是这个时代最精英的人写的最经典的著作……真正的思想，也许要说是真正在生活中与社会支配人们对宇宙的解释的那些知识与思想，他并不全部在精英和经典中。”^③这也是葛先生在这部《中国思想史》中要构建一种区别于“精英阶层思想”的“一般知识和信仰”的原因，而这种知识和信仰大多源自于除了传世文献留下的主流思想之外的出土文献、文物等原始文献当中，这也是为什么出土文献的出现对于学术界而言似产生新的生命，对于思想史也一样。而这一个新的角度，在战国时代的思想一章中也较为突出地表现出来，并且让屈原可以出现在战国时代的思想当中。

葛先生《中国思想史》第二编第六节“战国时代的精英思想和一

① 侯外庐撰《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文风书局1946年版，第328页。

② 同上，第329页。

③ 同上，第11至12页。

般知识：方术及其思想史意味”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们在战国的考古发掘中并没有发现这种理智思潮笼罩一切的倾向，相反，有一些迹象却向我们提示，在那些以改善具体生存状态为目标为思考内容，并以实现这些为目标的一般民众甚至贵族中，他们赖以支撑自信，维持伦理，并实现欲求的，并不是超越在世俗之上的哲理和学说，而是一整套有关礼俗、仪式的知识与技术，即从殷周一直延续着的解释宇宙与社会的知识，沟通人、神的技术，维持社会的礼俗和象征秩序的仪式。”^①而这些现象在古代社会的真实表现是建立了与天、与地、与人有关的方术知识，而在与天、与人两种“一般知识”中出现了《楚辞》的影子。

首先，在近年发现的包山楚简、望山楚简和《楚辞·九歌》相互印证的过程中，我们看到楚人对于“天”、“地”、“人”的经验和体察，以及由此建立的神的谱系，如出土文献中常见的《日书》等，可以看出中国人对于宇宙的观念和信仰。这些知识在传世文献（也就是诸子文章）当中虽有言及，然而并不构成主体，以至于当我们看到出土材料时才发现“战国时代大多数人还生活在一个充满了神秘气氛的世界，思想家的理智思考毕竟是少数人的事业”。^②

战国时代的思想世界中存在一个关注个体“人”的角度，在传统思想史中被老子、庄子的学说所代表，而这其中受到南方楚地思想影响的部分却并未涉及屈原。葛先生的思想史最先提出的便是《楚辞·远游》中表现的生命意识，其言“其中‘内惟省以端操兮，求正气之所由，漠虚静以恬愉兮，澹无为而自得’的人生态度，与‘餐六气而饮沆瀣兮，漱正阳而含朝霞，保神明之清澄兮，精气入而粗秽除’的养生方法，应该是战国时代许多人共有的一种思想……是属于宇宙观念和人生态度的，对个体生命意义的形而上的思考”。^③

葛兆光先生阐明了战国时代其实是有屈原思想存在的，或者说屈原的作品反映了战国时代的一般思想，而为什么屈原思想在传统思想史中无法占有位置呢？李零先生在《中国方术考》中在言及战国时代时有这么一段话：“中国的思想史研究者并没有忽略自己的这一时期。相反，他们的追溯总是从这一时期开始。但是由于史料的欠缺蒙蔽了

① 侯外庐撰《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文风书局1946年版，第219页。

② 同上，第229页。

③ 同上，第280页。

人们的视线，他们往往忽略了一个重要方面，即在诸子百家下边和这种思想活跃的前面，真正作为基础和背景的东西到底是什么。”^①而赵沛霖《屈赋研究论衡》言及屈原作品中丰富的神话思想时提出：“当春秋战国时代诸多思想家、哲学家以理性精神对政治、历史哲学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天命观念和宗教巫术思想展开猛烈抨击的时候，生活在具有宗教巫术文化传统楚国的屈原，却把理性批判的锋芒对准奇异怪诞的神话世界。”

这就是葛先生提出的“一般知识和信仰”，并且由于屈原不似诸子一般固守立场而著书立说，从另一个层面上讲，他的作品就如同出土文献般的“第一手资料”。屈原作品中的大量丰富的知识背景可以成为一般思想研究的重要数据，这些作品中的乐歌祭祀反映了没有被其他同时代人所记录的社会生活背景，我们很容易从中发现思想的痕迹，而这些痕迹往往才是最真实的状态。因此，从葛先生构建“一般知识和信仰”的思想史立场来看，屈原作品反映的思想内容，恰好是战国时代一般思想的真实反映。确实，在葛先生的思想史中，屈原成为战国时代思想的一个反映，而这个反映主要集中在当时一般知识阶层的整体状况。这个结论非常新颖。然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屈原作品中虽然保留了许多楚地民俗文化，但其最终仍是经屈原加工而成的一种更高层的文化思想，而这一点葛兆光先生有所忽视。

二、楚辞研究中的屈原思想

前文已说到，历代研究《楚辞》的著作大都集中在对于文本的研究上，而对于屈原思想的研究相对欠缺。“五四”之后逐渐有学者开始了对屈原思想的探索，此类研究大体可分为五种（赵沛霖先生《屈赋研究论衡》）：1. 屈原思想为儒家，郭沫若先生主之，学者多从之；2. 屈原思想为法家，李长之先生主之；3. 屈原思想为阴阳家和道家说，游国恩先生主之；4. 屈原思想为儒法兼具说，詹安泰、聂石樵等学者主之；5. 屈原思想有其独特内容，不能用先秦诸子某一家去比附，姜亮夫先生主之。

个人认为，几种说法之中，姜亮夫先生之说较为恰当。对于前几

^① 李零撰《中国方术考》，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

种将屈原思想归为某派某类的说法，姜先生在《楚辞学论文集·屈子思想简述》一篇中批评道：“历来论屈子思想，喜用《汉书·艺文志》九流之说，以为比附。至近世纪，此情愈演愈烈，于是屈子为儒家、为道家、为阴阳家、为神仙家，乃至是巫者……若许我充类言之，可以把《艺文志》九流全部塞到每家，皆成九流之总汇……正因屈原有许多思想，不能用某一家或某几家来绳束。”^①而姜亮夫先生则是从五方面构建的屈子思想：一为屈子从官能作用认识世界；二为屈子从物质的性行与变化认识物质；三为他从心理状态之认识，叙述情怀、人事关系；四为他从天人之际、人群之际、历史发展，来认识道德与人生意义、社会关系与政治美弊；五为屈子天道观。

此五个角度，每一种皆有所据，也皆言之有理，然而终究觉得有所缺失。此五点必然出自屈子思想，然而每一点皆是针对屈子个人之思想的构建，并未从思想史的范畴考察，也就是说，姜先生所构建的屈原思想，并未将其放在战国时代的整体中，没有与当时思想界的其他思想进行并列考察而说明意义。当然，这与姜先生写作的着眼点有关，而其对屈原思想整体考察的尝试，仍具有极大的意义。

三、屈原在战国思想史中的位置问题

在探讨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对前文所述两个问题进行总结。

首先，中国思想史中的战国部分，从目前所见几部思想史著作来看，屈原之所以未被纳入或被纳入而定位不够准确，其原因有三点：

第一，以哲学史、学术史轨迹所写的思想史（大部分通代、断代思想史，如钱穆先生《中国思想史》、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等）中的战国部分，其考察角度集中在先秦诸子。以这些内容组成的思想史，更偏向于哲学史范畴，是总结诸子百家时代各学派的思想理论，并未全面地利用各种史料考察一个时代的思想，因此作为文学作品的《楚辞》所反映的屈原思想便难以纳入这一类思想史中。

第二，关于屈原思想本身的研究，少有将其与思想史内容联系起来的。从郭沫若先生到姜亮夫先生等众多学者，虽然也将其思想与同

^① 姜亮夫撰《姜亮夫全集·楚辞学论文集》，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49至251页。